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日本學者的現代日本政治研究：多元主義的挑戰

The Pluralism Approach to the Modern Political Studies in Japan

doi:10.30390/ISC.201004/SP_49.0001

問題與研究, 49, 2010

Issues & Studies, 49, 2010

作者/Author：吳明上(Ming-Shan Wu)

頁數/Page：1-1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004/SP_49.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日本學者的現代日本政治研究： 多元主義的挑戰*

吳 明 上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摘 要

有別於戰後以來政治思想史、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多元主義於 1970 年代中期後在日本政治學界正式登場。利用個案研究、深度訪談與調查計量方法，多元主義針對現代日本政治的運作進行實證分析，而日本的政經與社會結構也出現多元化的現象，賦予多元主義解釋的有效性，使得多元主義研究蔚為日本政治學的新潮流。然而，1993 年自民黨的下野，以及聯合政權形態的常態化，政治決定架構出現重大的轉變，多元主義在此挑戰下，採取政策爭論點研究途徑與特定行為者的個案研究，努力建構普遍的解釋模式，以擺脫特定政黨執政的束縛。此外，日本媒體的詳實報導、政治家的回顧與紀錄、政治學者的深度訪談與整理分析，同樣提供實證研究的重要基礎資料，使得日本政治的實證分析成為可能。

關鍵詞：多元主義、自民黨政治、選舉研究、實證主義、官僚制

* * *

壹、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的政治學受到德國公法學、國家學的強烈影響，研究核心為國家及憲法學。^①戰後，日本的社會科學仍然受到戰前的影響，以分析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做為出發點，研究的主要課題是戰前、戰後體制的連續性，或是探討回歸戰

* 本論文曾於 2009 年 9 月 24 日發表於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舉辦之「日本研究與台日關係國際研討會」。

註① 雖然小野塚喜平次將政治學從國家學獨立出來，吉野造作提倡獨自的民主論，大山郁夫則研究社會學中的政治學，嘗試樹立「社會法則」，嘗試著將政治學作為「科學的政治學」，但是，研究的內容均無法避開「國家或國體（當時為法西斯主義）」，亦即均受到天皇制的時代制約。

前體制的可能性，^②研究的領域以歷史及思想史為主，對於現代日本政治運作的多元主義實證分析則要到 1975 年以後才陸續出現。

多元主義的登場對於 1975 年以後日本政經權力的多元化能夠提出有效地解釋與分析。戰後的日本政治研究，最先出現的研究模型是「菁英主義」(elitism)、「官僚支配」與「鐵三角支配」(政治家、官僚、財界等三者的結合)等最受到重視。官僚支配解開了日本在政權(政治家)更迭的頻繁下，為何能達到經濟高度發展的謎題，通產省與大藏省的官僚扮演關鍵角色。而「鐵三角支配」則對於自民黨為何能夠維持長久的政權，提供了有效的說明，政治利益是三者之間的重要黏著劑。但是，1975 年之後，官僚面臨石油危機帶來的財政拮据，出現力有未逮的窘境；與此同時，國會的政黨勢力結構出現「保革伯仲」(保守勢力與革新勢力相當)的現象，自民黨逐漸失去國會的優勢，朝野政黨必須協商以利解決政策問題。換言之，在日本政策決定過程中，出現了權力多元化的現象，意味著權力單一化的菁英主義再也無法滿足日本政治的實證研究，而此時登場的多元主義則提供了有效的分析。

本論文將先論述多元主義在日本政治學界登場的背景，從政治與經濟權力的多元化，來分析日本如何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走向多元政治。其次，日本政治權力多元化的出現，使得多元主義的研究成為可能，而其成果對日本政策決定過程的解釋也具有說服力。本論文將以現代日本政策決定過程的角度，論述當代日本多元主義研究的部分重要著作。最後，自民黨於 1993 年結束單獨政權，政策決定架構也隨之改變，加上選舉制度的改革、政黨支持系統的變化，多元主義的研究遭遇嚴峻的挑戰，如何面對自民黨政治終結的效應帶來的挑戰與因應，成為重要的課題。

貳、多元主義登場的背景：政經權力的多元化

大嶽秀夫研究指出，戰後日本的政治與政治學得以 1975 年作為分界線。戰後到 1975 年的期間，是「保守 VS. 革新」的意識形態對立期，亦即為「左右意識形態的對立」期間；而 1975 年以後迄今，則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各政黨均提出改革的主張)的改革時期，日本政治學得以排除意識形態的束縛，邁向實證主義。^③此處所指的意識形態係政治上的對立路線，事實上，自民黨政權自從經歷過岸信介內閣期間，因為警察官職務執行法修改而造成的對立，以及因為美日安全保障條約改定引發的社會對立與動亂後，積極關注民意動向，並吸收在野黨的政策議題。而在野黨也在政策決

註② 「戰前戰後連續性」主要代表是辻清明的官僚制研究，而「回歸戰前體制」則主要是以丸山真男的研究為代表。大嶽秀夫，*戰後政治と政治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1994 年)，序言。丸山真男雖然被視為戰後日本的政治學始祖，但是丸山真男屬於政治思想史領域，難以全然代表日本政治研究。

註③ 大嶽秀夫，「日本政治と政治学の転換点としての一九七五年：『レヴァイアサンたち』の三〇年」，*レヴァイアサン*，第 40 號(2007 年 3 月)，頁 20。

定過程中，與執政黨建立「默契」，迴避直接的政策衝突，例如，自民黨與社會黨透過名為「國會對策委員會」的政黨組織進行實質的政策協議與讓步，取代國會中的朝野對立，以致國會中的朝野對立成為朝野政黨向選民「表態」(performance)的場所(日本稱為「國對政治」)。^④質言之，自民黨與社會黨的意識形態對立在政策決定過程中逐漸徒具形式。

在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之際，多元主義之所以於 1970 年代中期後在日本登場，還有以下三個重要的背景要素。首先，雖然日本的政治確實由自民黨「單獨」執政，但是在幾個層次中，政治權力出現多元化的現象。在官僚體制方面，除了「本位主義」(sectionalism)所具備的多元化之外，日本的官僚體制本身便是具備包容多元化民意與利益的集團，以及具有鼓勵多元化參與的功能。飯尾潤研究指出，戰後的官僚體制在各相關領域吸收民意，且具有草擬及成立法案的能力，民意透過省廳反映在政策上，官僚體制具備了「省廳代表制」的功能。^⑤特別是，在執政黨與管道不太通暢的工會間，官僚體制扮演一個極佳的媒介角色。^⑥

更重要的是，大藏省(現今的財務省)與通產省(現今的經濟產業省)地位的凋落，加速了省廳之間的多元化現象。石油危機下的財政緊縮，導致大藏省與通產省失去了強化權力的財政工具。既往大藏省與通產省等官僚機構得以利用充裕的預算做為工具，開拓新業務與強化組織權限，但是在財政緊縮下，導致大藏省與通產省的權力弱化，加上各省廳對有限預算的激烈爭奪，助長了省廳間權力關係的多元化現象。^⑦

其次，自民黨本身亦為多元化的政治集團。自民黨是派閥的聯合體，自民黨政治是派閥競合關係建構出來的政治系統，因此自民黨是「分權式的政治集團」。野中尚人研究指出，自民黨政治的精髓在於各派閥共享執政的政治利益。^⑧自民黨本身除了派閥之外，又發展出後援會等地域性利益集團，以及「族議員」等政策偏好集團，而此等集團與官僚體制的互動連結，成為社會集團的利益管道，在自民黨政權中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最後，國會保革伯仲情形的出現，致使執政的自民黨失去國會的優勢，在野黨的政策活動變得相當活躍。同時，經過經濟高度成長而累積力量的「私部門」(企業、團體、工會、住民運動)，也從「公部門」取得自主性，在政治決定過程中產生不可忽視

註④ 關於「國對政治」請參考森田実，「国対政治：買収された野党」，文芸春秋，第 71 卷第 5 號(1993 年 5 月)，頁 150-153。伊藤達美，「検証『国対政治』の功罪」，中央公論，第 105 卷第 12 號(1990 年 12 月)，頁 130-146。

註⑤ 根據飯尾潤的研究，明治時期以來的官僚制是所謂的「官僚內閣制」，亦即官僚主要分擔行政職務，並牽制首相的領導權，因此官僚是各省廳的代理人。飯尾潤，日本の統治構造：官僚内閣制から議院内閣制へ(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 年)，頁 36-76。

註⑥ 例如，村松岐夫、辻中豊、伊藤光利，日本の政治 第二版(東京：有斐閣，2001 年)，頁 68。

註⑦ カーティス著、山岡清二訳，日本型政治の本質：自民党支配の民主主義(東京：TBS ブリタニカ，1987 年)，頁 126。

註⑧ 野中尚人，自民党政治の終わり(東京：筑摩書房，2008 年)，頁 119。

的影響力，^⑨而市民運動、消費者運動、女性運動等也以大眾傳播媒體為媒介，活躍地參加多元化的政治過程。^⑩

參、多元主義的分析方法與成果

從政策決定過程的觀點而言，日本的權力結構出現多元化的現象，已非既往的權力單一化的菁英主義或官僚主導所能夠概括解釋的，而日本政治權力多元化的出現，使得多元主義的研究成為可能，而其成果對日本的政策決定過程的解釋也具有說服力。1970 年代中期以後，多元主義對現代日本政治的研究陸續被發表，累積了豐碩的成果。本文僅以現代日本政策決定過程的角度，介紹以下重要的代表著作。^⑪

一、大嶽秀夫《現代日本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

大嶽秀夫於 1979 年出版的現代日本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⑫是多元主義分析現代日本政治的經典代表作。既往，現代日本政治的書籍大多由新聞記者或學者所撰寫的評論性著作，缺少理論性、學術性的架構，而關於政府與企業的「政治與經濟」著作亦多從馬克斯主義觀點出發，以國家獨占資本的概念論述政治與經濟的掛勾。但是，大嶽秀夫不僅從實證研究出發，也建構出理論系統。^⑬大嶽以「影響力」^⑭與「支配性組織」^⑮作為核心概念，並以「問題車輛」與「美日纖維交涉過程」作為個案，分析財界與企業的政治性權力，以及如何影響執政黨與官僚體制的決策過程。再者，大嶽秀夫

註⑨ 大嶽秀夫，「アメリカ政治学の受容と理論的実証分析の開始」，UP，第 25 卷第 6 號（1996 年 6 月），頁 24。

註⑩ 村松岐夫、辻中豊、伊藤光利，前掲書，頁 69。

註⑪ 關於多元主義分析現代日本政治現狀的重要著作尚有：猪口孝，現代日本政治經濟の構図：政府と市場（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83 年），該書利用民意調查法、計量經濟學方法、計量心理學、內容分析法等多元化的方法，論述日本政治與國際政治；蒲島郁夫，政治參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 年），蒲島郁夫在書中利用民意調查說明民主政治的動向；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衆の時代：戰後日本の解剖学（東京：中央公論社，1984 年），村上泰亮則利用「社會階層與社會移動全國調查」（The National Surve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SSM 調查）資料，主張現代日本在教育、文化與經濟等面向中，古典的社會階層與階級逐漸瓦解，持有「中間」意識的階層大量出現（新中間階層），引發廣泛地注意，「社會階層與社會移動全國調查」是指，日本社會學者從 1955 年以來，每隔十年針對社會階層、不平等、社會移動、職業、教育、社會意識進行的調查。

註⑫ 大嶽秀夫，現代日本の政治權力經濟權力（東京：三一書房，1979 年）。

註⑬ 綿貫讓治，「大嶽秀夫『現代日本の政治權力經濟權力』に寄せて」，社会科学の方法，第 13 卷第 10 號（1980 年 10 月），頁 12。

註⑭ 「影響力」是指，主體 A 與 B 之間的期待不一致時，B 遵照 A 的意思，或是 B 判斷 A 的意思去作為，則 A 對 B 具有影響力。

註⑮ 「組織」是指，集合資源（resource）據以產生權力的機制，「支配」是指，影響力行使的制度化，使影響力能實現並持久。因此，「支配性組織」是指，在某個制度領域中，存在著行使支配的組織。

利用美國的「鐵三角支配」模型分析日本的個案時，將研究的對象鎖定在一直被忽略的財界與企業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

大嶽秀夫研究發現，經濟權力有不受政治權力拘束的特徵。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在某層面上存在著相互對抗的牽制關係，但在另一層面，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相互承認（容許或默許）各自的活動領域，對侵害對方的領域相當自制。^⑩就政治權力的觀點觀之，財界與業界發揮影響力的管道如下：財界對於涉及日本經濟全體的政策爭論點（issues），主要是透過與政府、自民黨首腦的個人特殊關係，發揮影響力，^⑪業界對於具體的生產、金融問題，則透過大藏省、通產省、運輸省等相關省廳，以及自民黨政務調查會等相關部會的關係，發揮影響力。而業界間的對立主要是透過相關省廳及官廳間的協調來解決，同時業界也藉此機會將要求直接傳達給政府。再者，大嶽秀夫也指出日本政治過程中的二個特徵：第一是現代日本政治過程中，發揮影響力的主要「資源」（resource）是專門知識與情報的重要性，獨占專門知識與情報得以排除外來的影響；第二是各組織在各自的專門領域擁有相對的自主性，結果，各組織在各領域下制度化，某個組織難以跨越藩籬，對其他的組織發揮影響力。

二、村松岐夫《戰後日本的官僚制》

村松岐夫的戰後日本的官僚制^⑫則利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對於當時定論的「(官僚體制) 戰前戰後連續論」與「官僚主導論」提出反駁。村松岐夫針對 101 名國會議員與 251 名高級官僚進行問卷調查，並以深度訪談的資料作為基礎，提出幾點重要發現。首先，關於官僚制方面，在日本憲法的架構下，日本實現了議會政治，政黨成為實質上的政治支配集團，官僚在政黨與議會中間致力扮演行政角色。換言之，「政治性官僚體制」在現代日本政治中登場，而既往超然於議會與政黨的「古典官僚體制」則退場。^⑬其次，關於反駁當時蔚為主流論點的「官僚主導論」方面。村松岐夫以「活動量」及「自我支配性」等二個指標，來說明官僚與政治家的關係。戰後，特別是經濟高度成長期間，官僚的活動量確實龐大，表面上意味著官僚位居權力的中樞。例如，國會通過的法律案中，官僚提出的法律案占絕大多數；但從「自我支配性」觀之，官僚卻欠缺自我支配性。因為法律案送交國會前，必須事前送交自民黨相關部會接受政治家的審查或與政治家協調（事前審查）。因此，官僚不會提出保守政治家反對的方案，尤其日本是長期受到保守政黨統治的國家，官僚熟知保守政治家的政策意向。再者，官僚的人事晉升掌握在執政的保守政黨手中。所以，官僚不會脫離保守政黨的政策軌道，或是無視其存在，亦即官僚存在著「揣摩式反應」（expected reaction）。村

註⑩ 大嶽秀夫，前揭書，頁 30。

註⑪ 財界介入自民黨總裁選舉的情形請參考：三沢潤生，「政策決定過程の概観」，日本政治学編，現代日本の政党と官僚：保守合同以後（年報政治学）（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頁 5~33。

註⑫ 村松岐夫，戰後日本の官僚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

註⑬ 眞淵勝，「官僚制と政策過程」，伊藤光利、田中愛治、眞淵勝編，政治過程論（東京：有斐閣，2000年），頁 263~264。

松岐夫研究的結論是，官僚是活動量大但自我支配性低的集團，既往日本政治是官僚主導的論點顯然有誤。

三、猪口孝與岩井奉信的《族議員研究：自民黨政權的主導者》

猪口孝與岩井奉信的族議員研究：自民黨政權的主導者^①則以稻米價格的決定、稅制改革、國鐵民營化等個案分析，分析自民黨「族議員」的在政策決定過程中的主導力量。猪口孝與岩井奉信的研究是，繼村松岐夫的「政治家主導」論之後，進一步將政治家的範圍集中在「族議員」，使得研究更為精緻化。

所謂的「族議員」（Diet policy tribe）是指，對於特定政策領域具有相當程度的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繼而對相關官廳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家集團。猪口孝與岩井奉信研究發現，在政治決定過程中，「族議員」之所以具有影響力，主要是因為當選次數多，而在自民黨的長期執政下，經常參與國會特定的常任委員會，甚至擔任常任委員長，或者曾經被任命為某中央省廳的政務次官（現改為副大臣、政務官），或是曾經在黨內歷練過政務調查會相關部會長等職務。因此，族議員可以習得相當豐富的專業知識與立法實務，並且與特定省廳及官僚保持密切的人脈關係。^②而且，族議員長期參與特定政策的決定過程，反比短期擔任該相關職位的官僚熟悉政策相關知識與實施技巧（know-how）。特別是在石油危機後，「前例遵循主義」傾向的官僚，在面對國內外政經局勢的重大轉變下，在政治決定過程中出現力有未逮的窘境，族議員遂取而代之成為政治過程的主導者。

再者，政務調查會的組織也是強化族議員影響力的重要機制。自民黨的政務調查會為了順利完成任務，除了特別委員會之外，設置了十七個常設委員會，包括內閣部會、地方行政部會、國防部會、法務部會、外務部會、財政部會、文教部會、社會部會、勞動部會、農林部會、水產部會、商工部會、交通部會、通信部會、建設部會、科學技術部會、環境部會等，政務調查會相關部會是對應於中央省廳的規劃而設立的。例如，政務調查會的財政部會對應中央官廳的大藏省，政務調查會的交通部會對應中央官廳的運輸省。制度上屬於政務調查會部會或委員會的自民黨議員通常是該政策領域的「族議員」，在制度設計上，容易與相對應的官廳建立密切的關係。因此，佐藤誠三郎與松崎哲久便將「族議員」視為以省廳為單位的議員集團。^③

註① 猪口孝、岩井奉信，「族議員」の研究：自民党政權を牛耳る主役たち（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7年）。

註② カーティス著、山岡清二訳，前掲書，頁130~131。

註③ 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權（東京：中央公論社，1986年），頁244。

四、自民黨政權研究

佐藤誠三郎與松崎哲久的自民黨政權^㉓及中邨章與竹下讓的日本的政治過程：自民黨、在野黨、官僚^㉔則針對自民黨能維持長期政權的原因、自民黨的權力中樞所在，以及首相決定方式等問題提出解答。

佐藤誠三郎與松崎哲久認為自民黨政權維持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在「五五年體制」成立後，最大在野黨社會黨邁向反體制、左傾化的路線，弱化了「政權輪替」的可能性；第二，自民黨建立了黨政職位的人事制度，黨政人事依照派閥均衡與當選次數決定，穩定了自民黨的黨政運作；總裁是由派閥競合產生，而「總幹分離」原則（總裁與幹事長分屬不同派閥）有利於消弭大派閥之間的對立關係；^㉕第三，後援會與國會經營（吸收在野黨的政策）得以將民意適度地反映在政策上。值得一提的是，自民黨政權這本書的「第二部資料解題」，詳盡地蒐集了自民黨政權的各項基本資料，例如派閥、政務調查會各部會、官僚或地方首長（知事）出身的政治家、具有影響力的議員等，並逐項進行說明與分析，篇幅超過全書的 60%，因此也是研究自民黨政權的重要工具書。

中邨章與竹下讓的日本的政治過程：自民黨、在野黨、官僚則以菁英支配論的觀點，透過國會的立法行為（1965 年～1981 年）、兒童津貼制度的創設與實施、參議院比例代表制的採用等個案的研究，分析自民黨、官僚、財界的關係，同時提出理論上的反省。中邨章與竹下讓肯定自民黨、官僚、財界等三巨頭（鐵三角的菁英）的關係是分析自民黨政權運作的有效途徑，但同時也提出以下兩點反省之處：第一，菁英支配論點將現實的政治過於抽象化，導致理論與實際之間產生差異，例如菁英支配論將自民黨視為一個行為者，但是事實上自民黨卻是派閥的集合體，派閥之間的政治利益不同，換言之，菁英支配論忽略的菁英內部的對立現象；第二，菁英支配論將自民黨、官僚、財界等同視之，未區分政策決定過程中孰輕孰重，因此在進行個案分析時，中邨章與竹下讓特別注意自民黨內部政務調查會相關部會成員（族議員）與各相關省廳影響力的互動關係。

註^㉓ 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前掲書。

註^㉔ 中邨章、竹下讓，日本の政策過程：自民黨・野党・官僚（東京：梓出版社，1984 年）。

註^㉕ 自民黨總裁同時擔任首相職務，然因首相國務繁忙，政黨事務實際上委由幹事長處理。而幹事長事實上又負責選舉、政治資金分配，以及黨政人事的安排等重大事項，故幹事長的政治資源與權力巨大。假若總裁與幹事長系出同派，則不僅出現單一派閥掌握黨政資源，權力過度集中的弊端，同時也將引發大派閥的不滿。因此，「總幹分離」是消弭大派閥對立的重要原則。

肆、多元主義的挑戰與因應： 自民黨政治終結的效應

1970 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多元主義，對日本的政策決定過程，適時地提出更多元的解釋，包含財界、企業界、族議員、民意、在野黨、菁英間的競合關係等，有效地分析了政治權力的多元化。多元主義的有效解釋力使得多元主義蔚為現代日本政治研究的新潮流。^⑥但是，自民黨於 1993 年結束單獨政權時，多元主義隨即面臨到嚴峻的挑戰。雖然自民黨在短短二年五個月便取回政權，卻是以聯合政權的形態出現，加上選舉制度改革的效果、政黨支持系統的變化等，政策決定架構產生了巨大的變革，既往多元主義研究的基礎受到嚴重的衝擊。因為，多元主義在日本登場時，自民黨已經單獨執政近 20 年，多元主義登場後，自民黨繼續維持長期政權；所以，多元主義的實證研究是建立在自民黨單獨政權的基礎上。再者，也正因為如此，多元主義難以擺脫自民黨單獨政權所帶來的局限，形成所謂的「日本式的」多元主義，故而造成多元主義建構普遍解釋模式的束縛。

多元主義在面臨挑戰之下，同時企圖擺脫既往的束縛，採取的研究戰略是政策爭論點的研究途徑 (issue approach)，與特定行為者的個案研究。首先，關於政策爭論點的研究途徑，選舉研究是最受矚目的焦點。蒲島郁夫利用民意調查進行實證分析，追蹤分析導致「五五年體制」瓦解的 1993 年眾議院選舉，以及爾後政治變動中選民的態度變化，對 1993 年開始出現的頻繁的政黨重組提出有效的說明。^⑦再者，蒲島郁夫也利用投票行為研究方法，分析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後，過去藉由向地方利益輸送建構起來的自民黨支持系統開始瓦解，而自民黨為了延續政權生命，遂謀求其他政黨的合作，建立聯合政權。自民黨的合作夥伴中，公明黨因為具有穩固的票源，所以保持密切且長久的聯合關係。自公兩黨透過選舉合作的巧妙機制，不僅維持了政權的存續，自公兩黨也產生了「融合」的密切關係。^⑧

相較於蒲島郁夫的選民觀點，大嶽秀夫的政界再編的研究：新選舉制度的總選舉^⑨透過個案實證研究 (都市區選區、農村區選區、大企業勞資關係與選舉等個案)，從政治家、候選人的角度，亦即從選舉運動研究來分析新選舉制度的效果與產生的影響。大嶽秀夫對 1996 年眾議院選舉的研究發現，政治改革幾乎沒有達成當時的預期效果。例如，政治改革希望透過選舉制度改革，將既往的「候選人本位」選舉，轉變為「政黨本位、政策本位」的選舉。而「政黨本位、政策本位」的理念有二：一為政黨具有

註⑥ 猪口孝、大嶽秀夫、村松岐夫，「鼎談 戰後日本の政治学」，レヴァイアサン，創刊號 (1987 年 9 月)，頁 184。

註⑦ 蒲島郁夫，政權交代と有権者の態度変容 (東京：木鐸社，1998 年)。

註⑧ 蒲島郁夫，戦後政治の軌跡：自民党システムの形成と変容 (東京：岩波書店，2004 年)。

註⑨ 大嶽秀夫，政界再編の研究：新選挙制度による総選挙 (東京：有斐閣，1997 年)。

強大的領導權，並能接受國民全體的委託，擔負統治的責任；二為構築具有政權輪替功能的政黨系統，亦即當執政黨施政不力時，存在具有執政能力的在野黨。細川護熙內閣雖然取代自民黨執政，打出行政、經濟改革的口號，但是基本政策實質上卻是延續自民黨的政策方向。^{③①}

其次，關於特定行為者的研究方面。因小泉純一郎政權的特殊性，故成為現代日本政治分析的焦點。大嶽秀夫以「民粹主義」(populism)作為關鍵概念，從小泉首相的特異的性格、巧妙的民心掌握術、馬基維利式的權謀、執行的魄力，以及善用智囊團隊的才能等人格特質，藉由道路公團改革、郵政民營化、「911 恐怖主義」攻擊事件的日本對應、北韓綁架日本人事件等個案研究，解說為何小泉首相能發揮強大的領導權。大嶽秀夫指出，「民粹主義政治」的特徵是以善惡二元論為核心，將政治還原到道德層次的競爭。小泉首相以改革為號召，將反對改革的自民黨政治家稱為「抵抗勢力」，成功地獲取民意對小泉政權的支持，成為延續政權壽命的最大支撐力量。^{③②}

再者，關於官僚制的研究方面。1990 年代後，日本面臨國內外政經體制的重大轉變，政治家的政治主導能力出現了危機，^{③③}頻繁的政權輪替便是顯著的例證。值得關切的是，官僚對政策決定過程的影響力是否因此而轉強？此問題是現代日本政治分析的關注焦點。飯尾潤研究指出，因為官僚體制在行政改革下被削減了權力，官僚的霸氣與士氣低落，反之，在政治主導的政治過程中，官僚遵循執政黨的意向行動，因而逐漸失去自主性。加上「旋轉門」(revolving door, 高級官僚退休後到法人再就職)日益狹窄、退休年齡提早、官僚晉升速度減緩，導致特權意識快速地消失。官僚的職務雖然正在整編中，但是新的官僚形象尚未明朗化，官僚體制出現不安的現象。^{③④}而在政治家方面，根據村松岐夫的研究指出，既往官僚與政治家的密切合作關係消退，政治家與官僚的影響力均較既往低落。但是，高級官僚的「揣摩式反應」仍然存在，在政治過程中，政治家依然位居主導地位。^{③⑤}福原健太郎以「政治家的有力感」作為研究對象，也發現身為執政黨議員的身份，以及當選次數的增加，會增加議員的「政治上的有力感」，在議員增強自信心下，會強化議員對官僚的影響力。^{③⑥}

村松岐夫另以「委託人－代理人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說明官僚主導的

註③① 大嶽秀夫，前揭書，頁 363。

註③② 大嶽秀夫，日本型ポピュリズム：政治への期待と幻滅（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3 年）。大嶽秀夫，小泉純一郎ポピュリズムの研究：その戦略と手法（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6 年）。

註③③ 佐々木毅，政治はどこへ向かうのか（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 年），頁 12~14。

註③④ 飯尾潤，「内閣制の変容と官僚制」，2006 年度日本行政学会総会・研究会（2006 年 5 月 23 日，大東文化大学）。

註③⑤ 村松岐夫，「官僚制影響力の変化」，2006 年度日本行政学会総会・研究会（2006 年 5 月 23 日，大東文化大学）。

註③⑥ 福原健太郎認為，村松岐夫的調查是政治家與官僚的主觀意識調查，亦即在政治菁英的主觀認知調查中，可能包含國會議員的自尊，以及官僚的謙卑因素下，獲得政黨主導的結論。福原健太郎，「主觀的な政党優位論の客觀的な資源的基盤」，村松岐夫、久米郁男編，日本政治變動の 30 年：政治家、官僚、団体調査にみる構造變動（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6 年），頁 119~133。

誤解。一般將政治家與官僚視為政治過程中的競爭者，因此容易產生「零和遊戲」的誤解，亦即政治家權力的擴大意味著官僚權力的縮小，反之亦然。但是政治家與官僚並非權力對立的結構，而是政治家將權力「委託」給官僚去執行，亦即政治家長期且廣泛地將政策的形成與執行委託官僚進行，結果讓官僚誤以為自己位居權力的中樞。實際上，官僚提出的法案能夠順利通過，並非代理人（官僚）的權力巨大，而是證明了是委託人（政治家）的權威。³⁶

伍、結 語

1970 年代中期以後，日本政策決定過程出現了權力多元化的現象，以往權力單一化的菁英主義再也無法滿足日本政治的實證研究。此時登場的多元主義，有別於既往政治思想史、政治史或政治評論的論著，採取實證主義的研究途徑，對於現代日本政治提出具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並蔚為現代日本政治分析的新潮流。然而，1993 年自民黨的下野，以及聯合政權形態的常態化，政治決定架構出現重大的轉變。在此挑戰下，多元主義採取政策爭論點研究途徑與特定行為者的個案研究，據以分析現代日本政治決定過程。同時，為了擺脫自民黨長期政權帶來的局限，形成所謂的「日本式的」多元主義的侷限現象，多元主義也企圖建構普遍的解釋模式。

根據大嶽秀夫指出，政治資料的豐富是多元主義興盛不可或缺的條件。³⁷日本關於政治過程的情報相當豐富，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國家，不僅大眾傳播媒體對政治過程有詳實的追蹤報導，記錄政治家或官廳的互動，對於重要的政治事件更出版專書，提供第一線的基本資料。同時，政治家也出版專書，論述政策方向，或是描述當代的政治運作過程，而日本的政治學者或研究者也經常針對第一線的政治家進行訪談，並將資料整理與分析後出版。日本的媒體、政治家、學者的努力，使得多元主義對日本現代政治實證分析的研究成為可能。

戰後美國對日本的佔領政策與民主化改革，使得日本的政治學受到歐美政治學及憲法的影響，而日本政治學成為美國政治學的「消費者」。³⁸多元主義的登場，日本政治學者對現代日本政治的分析，不僅開啓政治學的新研究領域，更建構了日本的政治學。惟值得注意者，根據西方學者凱奇斯（John Kekes）的論述，多元主義和一元論最大的差異即在於多元主義否定優位價值的存在，³⁹正如同大嶽秀夫所指，雖然以レヴァ

註³⁶ 村松岐夫，「官僚制」，書齋の窓，第 488 號（1999 年 10 月），頁 2~7。

註³⁷ 猪口孝、大嶽秀夫、村松岐夫，「鼎談 戦後日本の政治学」，レヴァイアサン，創刊號（1987 年 3 月），頁 188。

註³⁸ 村松岐夫，「日本政治学の昨今」，學術の動向，2007 年 11 月號（2007 年 11 月），頁 72。

註³⁹ John Kekes, "Pluralism and the Value of Lif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Vol. 11, No. 4 (1994), pp. 44-60.

レヴァイアサン^④為平台的多元主義研究達成一定的成果，難免成為新的權威，但是為了レヴァイアサン創立的主要宗旨——「自由與闊達的辯論」，以及政治學的不斷革新，多元主義研究的發展應戒慎成為另外一個權威。^④就目前蔚為主流的日本政治多元主義研究而言，大嶽秀夫提出的警示，對日本政治學者的努力與自我期許深具啟發意義。

* * *

(收件：98年10月6日，接受：99年1月15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④ 「レヴァイアサン」刊名取自霍布斯的「巨靈」，1987年創刊時的編輯委員為大嶽秀夫、村松岐夫、豬口孝等三位學者，現此三位退居顧問，編輯委員由加藤純子、川人貞史、辻中豐、眞淵勝等四名擔任，出現世代交替的現象。基本上為半年性刊物，加上臨時特集號，迄今已經累積了四十四冊。

註^④ 大嶽秀夫，「日本政治と政治学の轉換点としての一九七五年：『レヴァイアサンたち』の三〇年」，レヴァイアサン，第40號（2007年3月），頁21。

The Pluralism Approach to the Modern Political Studies in Japan

Ming-shan W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I-Shou University

Abstract

Differs to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of political theory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cultural studies in postwar Japan, the pluralism approach had been introduced and connected to Japan's political studies since the mid-1970s. Because of various change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Japan, the pluralism approach, which especially emphasizes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case study, in-depth interview and survey study, was efficiently utilized to analyze Japan's practical politics and gradually becomes a popular academic trend. However, since the LDP lost its power over government in 1993, the coalition cabinet regime as a new replacement to the old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 has made an obvious change in Japan's politics. The pluralism approach adequately explains Japan'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via research methods of policy-dispute and case study of particular actors. Besides, many fundamental empirical research materials, such as the detailed news reports, politicians' biographies and academic interview records, are also beneficial for pluralistic scholars to engage in studying Japan politics.

Keywords: pluralism; LDP politics; electoral study; positivism; bureaucracy

参考文献

- Kekes, John, "Pluralism and the Value of Lif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Vol. 11, No. 4 (1994), pp. 44~60.
- カーティス著，山岡清二譯，日本型政治の本質：自民党支配の民主主義（東京：TBSブリタニカ，1987年）。
- 大嶽秀夫，現代日本の政治権力経済権力（東京：三一書房，1979年）。
- _____，戦後政治と政治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1994年）。
- _____，「アメリカ政治学の受容と理論的実証分析の開始」，UP，第25巻第6号（1996年6月），頁20~24。
- _____，政界再編の研究：新選挙制度による総選挙（東京：有斐閣，1997年）。
- _____，日本型ポピュリズム：政治への期待と幻滅（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3年）。
- _____，小泉純一郎 ポピュリズムの研究：その戦略と手法（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2006年）。
- _____，「日本政治と政治学の転換点としての一九七五年：『レヴァイアサンたち』の三〇年」，レヴァイアサン，第40号（2007年3月），頁20~35。
- 三沢潤生，「政策決定過程の概観」，日本政治学編，現代日本の政党と官僚：保守合同以後（年報政治学）（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頁5~33。
- 中邨章、竹下譲，日本の政策過程：自民党・野党・官僚（東京：梓出版社，1984年）。
- 伊藤達美，「検証『国対政治』の功罪」，中央公論，第105巻第12号（1990年12月），頁130~146。
- 佐々木毅，政治はどこへ向かうのか（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年）。
- 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権（東京：中央公論社，1986年）。
- 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衆の時代：戦後日本の解剖学（東京：中央公論社，1984年）。
- 村松岐夫，戦後日本の官僚制（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81年）。
- _____，「官僚制」，書齋の窓，第488号（1999年10月），頁2~7。
- _____，「官僚制影響力の変化」，2006年度日本行政学会総会・研究会（2006年5月23日，大東文化大学）。
- _____，「日本政治学の昨今」，学術の動向，2007年11月号（2007年11月），頁72。
- 村松岐夫、辻中豊、伊藤光利，日本の政治（第二版）（東京：有斐閣，2001年）。
- 眞淵勝，「官僚制と政策過程」，伊藤光利、田中愛治、眞淵勝編，政治過程論（東京：有斐閣，2000年），頁252~272。
- 野中尚人，自民党政治の終わり（東京：筑摩書房，2008年）。
- 猪口孝，現代日本政治経済の構図：政府と市場（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83年）。
- 猪口孝、岩井奉信，「族議員」の研究：自民党政権を牛耳る主役たち（東京：日本経

濟新聞社，1987 年)。

猪口孝、大嶽秀夫、村松岐夫，「鼎談 戦後日本の政治学」，レヴァイアサン，創刊號 (1987 年 9 月)，頁 183~197。

森田実，「国対政治：買収された野党」，文芸春秋，第 71 卷第 5 號 (1993 年 5 月)，頁 150~153。

蒲島郁夫，政治参加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 年)。

_____，政権交代と有権者の態度変容 (東京：木鐸社，1998 年)。

_____，戦後政治の軌跡：自民党システムの形成と変容 (東京：岩波書店，2004 年)。

関谷昇，「戦後日本政治学はどう再生するのか？」，UP，第 31 卷第 4 號 (2002 年 4 月)，頁 28~32。

綿貫讓治，「大嶽秀夫『現代日本の政治権力経済権力』に寄せて」，社会科学の方法，第 13 卷第 10 號 (1980 年 10 月)，頁 10~15。

飯尾潤，「内閣制の変容と官僚制」，2006 年度日本行政学会総会・研究会 (2006 年 5 月 23 日，大東文化大学)。

_____，日本の統治構造：官僚内閣制から議院内閣制へ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 年)。

福原健太郎，「主観的な政党優位論の客観的な資源的基盤」，村松岐夫、久米郁男編，日本政治変動の 30 年：政治家、官僚、団体調査にみる構造変動 (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2006 年)，頁 119~133。